

# 跨越增长阵痛期： 中国经济结构向高质量服务化转型

白雪洁 宋培 逯海勇 李琳\*

**摘要：**本文再次验证“结构性减速”在中国的成立性，指出中国经济“服务化”的“被动”属性，并阐述“被动服务化”的特征事实及后果，最后探索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服务化的可能路径。研究表明，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处于“去农业化”阶段，自2012年起，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但这种“服务化”是一种建立在制造业“未高先衰”上的“被动服务化”；此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被动服务化”引致的“结构性减速”，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下降；生产要素被迫流入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可能导致中国服务业低端蔓延和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

**关键词：**被动服务化；结构性减速；鲍莫尔成本病；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2.9

## 一、引言

相较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去除了“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的要求，并首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与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的普遍规律是否相悖？关于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经验性学说，从“配第-克拉克”定理到库兹涅茨的“结构性加速”理论，再到鲍莫尔-富克斯的“结构性减速”理论，都揭示出伴随人均收入提升，经济重心将从农业向工业进而向服务业转移的一般性规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国家整体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减速的幅度越大，这似乎与“结构性减速”现象相吻合。对此，多数学者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一般

\*白雪洁，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baixuejie99@163.com；宋培（通讯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1120201039@mail.nankai.edu.cn；逯海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1120201019@mail.nankai.edu.cn；李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lilin03697965@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国经济条件下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大问题研究”（批准号：21&ZD099）、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数字技术驱动经济结构优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效应评估与政策创新”（批准号：2021YJSB037）、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与‘鲍莫尔成本病’——理论反思与现实考察”（批准号：ZB22BZ0105）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规律出发,认为增速下滑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不是结构性的,而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限所致(袁富华,2012;吕健,2012;王兵、尹淑桃,2020)。若此轮经济增速下滑属于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那么“十四五”期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否有必要,或者说如何能保持?换一个角度,发达国家中制造业还保持较高比例的日、韩、德等国家,目前其人均GDP为3万—4万美元,制造业比重普遍保持在20%以上,而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制造业占比已从2011年的32.06%下降至2020年的26.18%,这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过早或过快“去工业化”的担忧(郭克莎、彭继宗,2022;江飞涛等,2022)。虽然制造业占比下降与其分工水平不断提升、非制造环节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有一定关联,但现阶段中国工业和农业部门对生产性服务的派生需求还没有达到足以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程度,即服务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具有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密集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尚未有效形成。由结构性、体制性的资源错配带来的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不同于工业化高级阶段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可能是过早“去工业化”,或者说是制造业的“未高先减”导致的。与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时面临的单一问题不同,中国当前所遇到的是复杂性、结构性和系统性交织的难题,若不能顺利实现增长动能转换,这种转型“阵痛”很可能会演变为“久痛”。当下,中国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结合中国现实系统性地梳理和探讨经济“服务化”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对推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至关重要。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经济真的进入“服务化”阶段了吗?最近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是由“服务化”带来的吗?如何避免像拉美国那样,在经济转型中长期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久痛”?

已有文献主要围绕中国经济结构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以及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展开,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观点仍存在争议。如张月友等(2017)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还不突出,尚未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工业生产率下降是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杨天宇和曹志楠(2015)则提出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才是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但蔡昉(2021)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存在着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郭克莎(2022)指出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结构性减速”压力;韩永辉等(2016)从中国省份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发现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宋建和郑江淮(2017)通过构建Baumol非平衡增长模型验证了服务业“成本病”与“结构性减速”的存在。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虽然基于一个或多个视角对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和经济增速放缓现象展开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且不乏国际比较与历史分析,但考虑到当前产业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产业融合、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不断蔓延渗透的客观条件变化,以及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多重叠加的主观因素变动,综合纳入以上主客观环境的系统性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在充分考虑产业内涵和外延拓展、产业间融合互动等新发展趋势的前提下,以典型事实的统计分析对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和“结构性减速”问题进行了再验证,指出2012年这个关键节点,正是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的起点;二是提出中国经济“服务化”是一种建立在制造业“未高先衰”基础上的“被动服务化”,并分析了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三是探索了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服务化的可能路径。本文研究为“十四五”期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顺利渡过经济转型“阵痛”期提供政策启示。

## 二、中国“结构性减速”再验证

伴随着新技术新产业变革与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作为其事实论据的国际经验对当今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受到质疑。一是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中的服务业相比,现阶段服务业的内涵、内容和形式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延伸,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边界趋于融合模糊;二是与西方发达国家自然演进的产业结构变迁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时间压缩的特点,就业人口持续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即“工业化”与“服务化”具有一定的交叉并行特征。因此,判断中国是否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经济真的“服务化”了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由“服务化”带来的吗?

### (一) 中国经济真的“服务化”了吗?

#### 1. 基于产出份额变化趋势的判断

本文首先基于产出份额的变化趋势判断中国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图1显示了中国1978—202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2012年之前,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在45%~50%区间内震荡波动,而第三产业占比则逐年上升,表明中国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并非建立在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的前提下。这意味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再“服务化”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呈现为“去农业化”。但2012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且自此之后第二产业占比由45.42%连年下滑至2020年的37.82%,而第三产业占比则逐年上升,到2020年已达到54.53%。从三次产业产出份额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第二产业占比出现长达9年的连续下滑,且这9年间第三产业占比增加超过10%,表明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一升一降”并非短期波动而是长期趋势;相较于2012年之前,2012年后第二、三产业占比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至2020年扩大至16.71%。综上,基于产出份额的变动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自2012年起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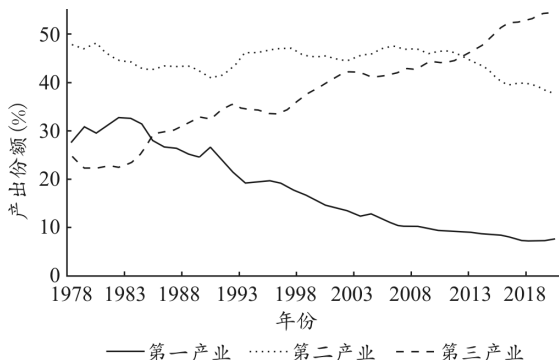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1978—202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 2. 基于劳动份额变化趋势的判断

本文基于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判断中国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图2显示了中国1978—2020年三次产业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从图2(a)中可以看出,2012年之前,第一

产业的劳动份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70.53% 逐渐下降至 2012 年的 33.49%, 第二、三产业的劳动份额分别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17.30% 和 12.18% 上升至 2012 年的 30.46% 和 36.05%, 表明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制度的改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增长, 以及由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和城镇化所推动的服务业的发展, 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 1978—2012 年中国劳动份额变化呈现出“工业化”与“服务化”并行的趋势。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逐步演进趋势, 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增加均来自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释放, 这意味着仅从服务业劳动占比提高来判定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服务化”是不大合理的。从劳动份额判断经济结构是否“服务化”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长时期、大规模地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 即劳动份额变化呈现单一的“服务化”特征。根据图 2(b) 可知, 2012 年之后, 第二产业劳动份额与上年相比持续呈现负增长, 而第三产业劳动份额与上年相比一直是正增长。这表明自 2012 年起, 服务业劳动力的增加不仅来自农业, 也来自工业, 劳动份额在产业间呈现出“两低一高”的变化趋势, 意味着服务业正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体部门。综上, 基于劳动份额的分析同样可以发现, 中国经济自 2012 年起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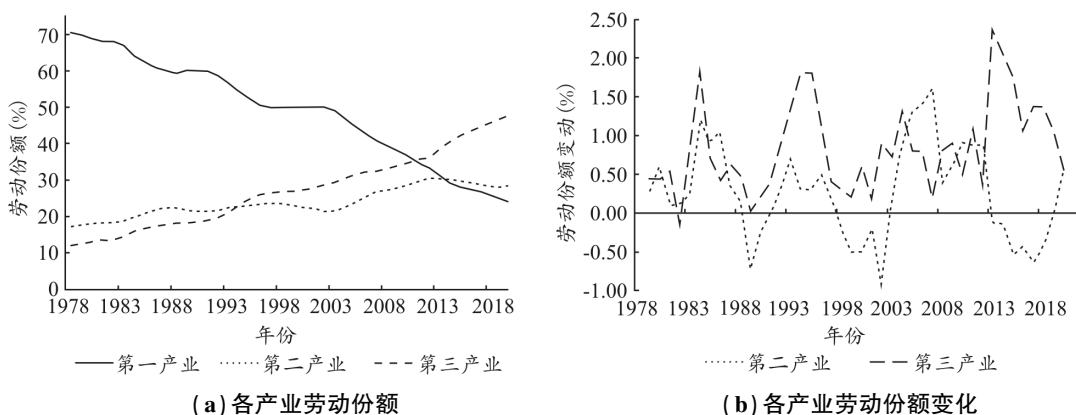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 1978—2020 年三次产业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 (二)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由“服务化”带来的吗?

### 1. “结构性减速”的生产率差异前提

上文从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变动的角度验证了中国经济“结构向上”的典型特征, 而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基本事实也已揭示出“增速向下”的发展态势。那么, 同一时间段在趋势上的此起彼伏是否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呢? 根据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结构性减速”是劳动力从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导致的, 需要同时满足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和部门间生产率差异两个前提。对前者而言, 中国经济的“结构向上”表明生产要素正逐渐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因此, 要验证“结构向上”与“增速向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只需证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普遍高于服务业部门。从国际经验来看,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率显著高于服务业, 然而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 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特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三产业生产率孰高孰低在学界仍存有争议(庞瑞芝、邓忠奇, 2014)。接下来,

本文采用 DEA 方法测算 2007—2019 年 39 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计算出每年工业和服务业分行业的生产率均值来比较产业间的生产率差异<sup>①</sup>,测算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2007—2019 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显著高于服务业,故可判定经济“服务化”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此外,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动相对平缓,相比之下,工业生产率的增长率上下波动更剧烈一些,但二者均未呈现出显著的骤降趋势,表明中国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减速”,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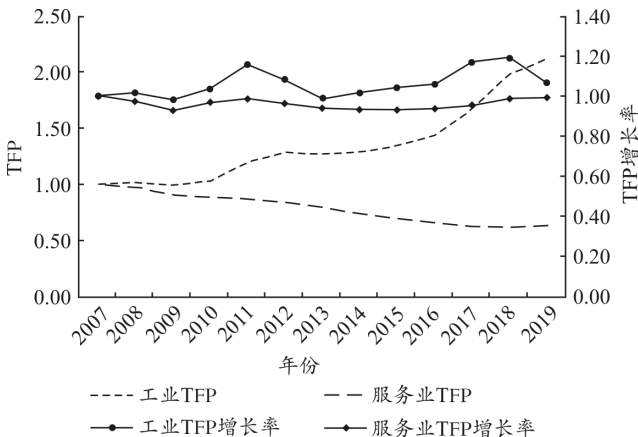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 2007—2019 年第二、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作者测算绘制。)

## 2. 产业互动视角下“结构性减速”成立性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产业互动如制造业服务化、两业融合等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孤立地看待工业和服务业,忽视产业互动对两部门生产率的影响,就得出“结构性减速”在中国成立的结论会受到质疑(席强敏等,2015)。产业互动理论认为,在经济结构向服务化转型阶段,工业的规模化、专精化发展可以引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增加,而生产性服务业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进而有利于提高服务业整体生产率水平;反过来,服务业的发展壮大能够更好地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生产率提升。这一良性的产业互动模式将会通过提升全行业生产率弥合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进而抵消“结构性减速”,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接下来,本文基于产业互动视角进一步分析“结构性减速”理论在中国能否成立。本文利用中国 2002—2017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sup>②</sup>,实证检验产业互动对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TFP_{it} = \alpha_0 + \alpha_1 INT_{it} + \beta \vec{X}_{it}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1)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被解释变量  $TFP$  表示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全要

①工业行业资本投入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服务业行业资本投入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工业行业劳动投入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服务业行业劳动投入采用服务业全社会总就业人数乘以服务业分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在服务业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估算得到;产出使用行业增加值,并以 2007 年为基期对所有以名义价值表示的数据进行价格调整。

②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本文样本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数据。

素生产率,采用 Super-SBM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进行测度;核心解释变量  $INT$  表示产业互动,从工业使用的服务品投入和服务业使用的工业品投入两个方面衡量,分别以地区投入产出表中工业使用服务品中间投入( $PIS$ )和服务业使用工业品中间投入( $PSI$ )的完全消耗系数衡量<sup>①</sup>;  $\vec{X}$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资本深化( $KL$ ),采用各地区人均资本衡量;人力资本( $HR$ ),采用各地区在校大学生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政府支出( $GOV$ ),采用各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之比衡量;对外出口( $EX$ ),采用各地区出口额占 GDP 之比衡量;资源禀赋( $RES$ ),采用各地区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之比衡量; $\mu_i$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mu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文计量回归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并以 2002 年为基期对所有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数据进行价格调整。表 1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TFP$	工业生产率	480	0.446	0.271	0.066	1.251
$STFP$	服务业生产率	480	0.531	0.240	0.068	1.147
$PIS$	服务品投入水平	480	0.399	0.225	0.008	1.268
$PSI$	工业品投入水平	480	0.849	0.346	0.118	1.904
$EG$	经济增速(%)	480	2.061	3.921	-9.627	14.991
$STR$	服务化水平(万元/人)	480	1.104	0.572	0.527	4.894
$KL$	资本深化	480	74.220	52.959	9.165	291.382
$EX$	出口	480	16.747	18.893	1.162	92.717
$GOV$	政府支出	480	0.218	0.105	0.081	0.758
$HR$	人力资本	480	0.016	0.007	0.003	0.037
$RES$	资源禀赋	480	0.045	0.039	0.000	0.222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 2 第(1)至(4)列为产业互动对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工业使用的服务品投入越多越可以显著提升工业和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服务业使用的工业品投入越多反而越不利于其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可以通过扩大工业品需求提升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来看,由于正负影响的相互抵消,产业互动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很小,但能够显著提升工业生产率。这一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仍成立<sup>②</sup>,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3 第(1)至(4)列。结合中国当前的产业发展现实,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突出,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都较小,服务业在工业化发展中的从属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余泳泽、潘妍,2019;戴魁甲等,2023)。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中国产业互动并未形成良性的双向促进模式,不能推动全行业生产率的整体性提升,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即使考虑产业互动的影响,“结构性减速”仍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公布的 2002 年、2007 年、2012 年、2017 年地区投入产出表,使用 RAS 法扩展得到其余年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

②采用基于 DDF 模型的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

表 2 实证回归结果

	工业 TFP		服务业 TFP		经济增速
	(1)	(2)	(3)	(4)	
PIS	0.040** (0.018)		0.078** (0.034)		
PSI		0.066** (0.032)		-0.068*** (0.025)	
STR					-1.673** (0.76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961*** (0.045)	0.963*** (0.044)	1.039*** (0.037)	1.028*** (0.036)	4.563*** (1.642)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R <sup>2</sup>	0.823	0.823	0.812	0.812	0.665
N	480	480	480	480	480

注：\*\*\*、\*\* 分别表示 1%、5%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替换被解释变量				调整样本范围	GMM 估计
	(1)	(2)	(3)	(4)		
PIS	0.122** (0.058)		0.092** (0.036)			
PSI		0.132*** (0.042)		-0.094*** (0.026)		
STR					-2.047*** (0.781)	-0.498*** (0.17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988*** (0.052)	1.019*** (0.050)	1.255*** (0.037)	1.250*** (0.036)	4.974*** (1.596)	1.900** (0.837)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2)-P 值						0.451
Hansen-P 值						0.982
R <sup>2</sup>	0.626	0.630	0.735	0.735	0.672	
N	480	480	480	480	480	450

注：\*\*\*、\*\* 分别表示 1%、5%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

### 3.“结构性减速”的实证检验

接下来,本文基于 2002—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实证层面直接检验中国经济“服务化”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因果关系。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G_{it} = \alpha_0 + \alpha_1 STR_{it} + \beta \vec{X}_{it}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2)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被解释变量  $EG$  表示地区经济增速,采用各地区实际人均 GDP 的增长率衡量;核心解释变量  $STR$  表示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采用各地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上文相同。

表 2 第(5)列报告了产业结构“服务化”对经济增速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产业结构“服务化”会对经济增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中国经济“服务化”转型并未产生“结构红利”,也没能摆脱“结构性减速”这一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反而阻滞了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结论在调整样本范围<sup>①</sup>、采用 GMM 估计方法后

①为防止极端值带来的估计偏误,将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 1% 的缩尾处理。

仍成立,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3第(5)列和第(6)列。

### 三、“被动服务化”的特征事实及后果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自2012年起正式迈入单向“服务化”的结构变迁路径,这种“服务化”带来的“结构性减速”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但不同于发达国家自然演进的结构转型,中国的“服务化”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带有一定的被动早熟特征,是一种“被动服务化”。如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强制性和自发性相结合,自发性渐次取代强制性,但仍存在要素配置扭曲;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的矛盾长期存在。因此,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被动服务化”,接下来本文重点阐述中国经济“被动服务化”的特征事实及其后果<sup>①</sup>。

#### (一) 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特殊性及根本原因——“被动服务化”

##### 1. 中国与发达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变化对比

首先,相较于美、英等高收入经济体,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从表4来看,2010—2020年,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11年内第二产业比重下降8.48%,制造业比重下降5.31%,而美国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21年间制造业比重仅下降0.64%,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制造业比重反而有所上升。此外,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来看,中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增长率相对较低,这与制造业结构中先进制造业占比不足密切相关。2010—2020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12%,而在此阶段美、英、法、德、日、韩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63%、4.62%、5.90%、4.25%、6.06%、6.55%。因此,从美、英、法、德、日、韩等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经济体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一般处于从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的过渡期,此时制造业仍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根据表4,美、英、法、德、日、韩等高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在其经济转型前后变化不大,且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保持稳定增长,而中国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最终导致“结构性减速”压力过大。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特殊性之一在于过早、过快地“去工业化”。

其次,相较于美、英等高收入经济体,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服务业比重上升过快。从表4来看,2010—2020年,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11年内服务业比重上升9.8%。而美、英、德、日、意等高收入经济体在整个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期服务业比重仅上升3.31%、5.34%、1.11%、4.74%、2.81%。尽管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但中国这种“快速服务化”明显区别于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经验。究其根本,中国当下的服务化带有“被动”属性。一方面,中国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再加上节能减排的硬性约束,制造业出现“未高先衰”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专利、品牌塑造等方面的飞跃,对要素的吸引力就已经显得相对乏力,导致要素配置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系统性扭曲。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产业结

<sup>①</sup>与发达国家市场主导下经济结构向服务经济形态的自然演进不同,本文“被动服务化”是指经济结构的“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快服务化”,关键特征表现为制造业“未高先衰”和服务业“低端蔓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构高级化和服务化的误解与误判,加速“去工业化”。由于制造业转型升级遭遇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等多重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忽视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竞争优势,片面追求“去工业化”,同时加大对金融、房地产等既能拉动GDP增长,又能保税源的服务业的支持,加速推动要素向服务业流动。根据统计数据,2007—2019年,中国服务业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速达到17.65%,而工业仅为服务业的一半,为8.56%<sup>①</sup>。因此,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在11年内快速上升了9.8%,远高于美、英等高收入国家在此阶段的服务化速度。

表4 中国与发达国家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结构变化指标<sup>②</sup>

国家	阶段	年份	第二产增加值比重(%)	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区间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美国	上中等收入	1941年	31.38	24.37	60.75	1947—1962年	2.63
	高收入	1962年	32.50	23.73	64.06	1963—1972年	2.38
英国	上中等收入	1953年	52.06	39.54	43.70	1960—1973年	4.62
	高收入	1973年	47.50	34.78	49.04	1974—1983年	1.87
法国	上中等收入	1960年	30.50	12.89	63.51	1960—1971年	5.90
	高收入	1971年	36.24	17.26	59.43	1972—1981年	2.98
德国	上中等收入	1960年	47.03	31.42	50.72	1960—1973年	4.25
	高收入	1973年	46.01	32.82	51.83	1974—1983年	2.11
日本	上中等收入	1968年	41.55	33.01	52.43	1968—1977年	6.06
	高收入	1977年	38.11	28.18	57.17	1978—1987年	3.41
意大利	上中等收入	1968年	45.56	31.95	44.30	1968—1978年	4.28
	高收入	1978年	45.02	33.90	47.11	1979—1988年	3.39
西班牙	上中等收入	1973年	45.67	33.75	42.05	1973—1990年	2.65
	高收入	1990年	39.93	26.48	52.28	1991—2000年	1.25
新加坡	上中等收入	1978年	32.92	24.39	65.73	1978—1988年	3.37
	高收入	1988年	36.59	28.37	63.06	1989—1998年	5.13
韩国	上中等收入	1988年	43.45	32.16	45.56	1988—1995年	6.55
	高收入	1995年	44.59	30.69	48.15	1996—2005年	7.20
中国	上中等收入	2010年	46.50	31.60	44.20	2010—2019年	2.12
	-	2020年	38.02	26.29	54.00	-	-

数据来源:(1)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GGDC 数据库,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2)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 (PWT10.0 数据库, <https://www.rug.nl/ggdc/structuralchange/>); (3) 郭克莎, 2022:《突破结构性制约的中国探索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 2. 中国与发达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服务业内部结构对比

首先,从中国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内部结构对比来看,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大量劳动力集中于生活性服务业。从表5服务业内部各产业劳动力占比来看,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的劳动力占比高达40%,而运输、仓储和通信,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的劳动力占比共为16%,这意味着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劳动力大量聚集于生活性服务业。由此可知,虽然中国自2012年进入服务化阶段,但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大多被生活性服务业而非生产性服务业所吸收,这种劳动要素由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转移加大了“结构性减速”压力。

①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测算得到。

②由于数据缺失,美国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数据从1947年开始,英国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数据从1960年开始。

表 5 中国与发达国家上中等收入阶段服务业劳动力占比

	贸易、餐饮和酒店	运输、仓储和通信	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	政府服务	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
美国	0.35	0.14	0.12	0.33	0.07
英国	0.29	0.29	0.05	0.33	0.05
法国	0.32	0.12	0.12	0.39	0.05
德国	0.41	0.14	0.10	0.27	0.07
日本	0.43	0.12	0.14	0.25	0.05
中国	0.28	0.12	0.04	0.17	0.40

数据来源: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GGDC 数据库,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其次,从 2010—2020 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劳动力及其生产率变动来看(见表 6),生活性服务业仍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且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率呈现为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其中,从劳动力存量来看,2020 年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是服务业内部劳动力占比最多的前三个行业,吸纳了约 48.56% 的服务业劳动力。从劳动力变动来看,虽然近 10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占比有所提高,但生产率却不涨反退,劳动力的流入仍是效率损失的体现。因此,细分行业的分析表明,第一,生活性服务业仍是服务业中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行业,近 10 年快速服务化过程中大量劳动力进入生活性服务业属于“被动服务化”;第二,虽然有部分劳动力流向了生产性服务业,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低端发展状态,不能实现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跃迁。

表 6 2010—2020 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劳动力占比及生产率

	劳动力占比 (%)			劳动生产率		
	2010 年	2020 年	变化	2010 年	2020 年	年均增长率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71	19.22	-1.49	11.35	11.98	0.00
教育	22.93	19.09	-3.84	7.61	9.82	0.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9.17	10.25	1.08	9.46	11.13	0.01
金融业	6.81	8.37	1.56	44.63	46.70	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15	7.91	-1.23	30.32	23.97	-0.02
批发和零售业	7.76	7.67	-0.09	66.80	58.58	-0.0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50	6.27	1.78	25.10	24.20	0.00
房地产业	3.07	5.12	2.05	107.67	67.05	-0.0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69	4.75	2.05	47.80	37.67	-0.0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24	4.20	-0.04	19.28	26.89	0.03
住宿和餐饮业	3.03	2.50	-0.53	38.57	28.58	-0.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17	2.39	-0.78	8.00	11.45	0.0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0	1.46	-0.45	18.99	22.40	0.0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87	0.81	-0.07	101.36	94.75	-0.01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综上,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服务化”具有两点特殊性:一是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生产率增长率过低;二是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生产率增长缓慢。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是发达国家在其“去工业化”过程中保持高生产率的关键,即使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持续优化也能支撑经济增长,这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经济服务化”呈现出“被动”“早熟”特征,即“被动服务化”。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向后期成功转型、制造业仍处于中低端徘徊的情况下,大量生产要素涌入

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容易造成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衡,并不满足生产资源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原则,这也是中国“结构性减速”比发达国家更为明显的根本原因。

## (二)“被动服务化”的后果

### 1. 服务业发展呈现低端蔓延态势

就一般发展规律而言,制造业会因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分工细化,对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持续需求,同时传统服务业因适应需求变化、应用新技术等也会不断发展,从而整体优化服务业结构和提升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但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仍处于传统服务业占主体、以个人消费需求拉动服务业增长的第一阶段,因为前述的一些非自然演进因素影响,带有“被动服务化”和内部结构失衡的特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要素过早地流出工业将导致服务业发展呈现低端蔓延态势。

在劳动要素方面,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门槛,劳动密集型的生活性服务业便成了囤积大量较低人力资本水平和职业素养劳动者的就业蓄水池,即便是部分生活性服务行业已经开始应用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但支撑行业发展的劳动力结构仍然是低技能型的。袁富华等(2016)认为类似的服务业发展是被低技能的“人口漂移”所左右,例如从农村漂移到城市的初级劳动力成为小商小贩,集聚于非正式服务业部门,最终导致中国低端服务业蔓延。在资本要素方面,当前中国服务业结构性问题突出,一方面,发展规模较小的生产性服务业无法容纳大量的资本流入;另一方面,虽然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较高,但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在激励性投资制度等尚不完善的中国,资本更倾向于流入收益更高的房地产和乘上新技术革命快车道的生活性服务业,如2021年共享经济领域的直接融资规模达到2137亿元<sup>①</sup>。这既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又激化了服务业内部的结构矛盾,最终表现为服务业发展的低端蔓延,加剧了低端服务业的过度竞争。综上,“被动服务化”下生产要素流入生活性服务业,本质上表现为低效率的服务业对相对高效率的制造业的替代,这种效率损失轻则导致经济增速放缓,重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拉美国家正是在这种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失败下丧失经济增长动力,陷入长期经济震荡与停滞。

### 2. 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

制造业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保证制造业比重处于合理区间成为中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仍离不开大量劳动力供给,服务业“过早”抢夺制造业劳动力数量会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命周期空间缩短,难以更好地发挥区域间产业“雁阵式”发展的大国经济优势。更为严重的是,从劳动力质量视角来看,服务业可能会抢夺制造业技能型劳动力,从而导致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相较于服务业,制造业在工资待遇上不具有明显优势,外加服务业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具有舒适优越的办公环境,导致制造业在技能型劳动力的争夺上陷入劣势(Matthew and Basit, 2018; 铁瑛、崔杰, 2020)。若技能型劳动力能顺利流向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仍可支撑制造业的发展。但若受制度不完善、高度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流向生活性服务业,则会加剧制造业的人才流失,在引进模仿等“技术红利”逐渐削减的背景下,很容易导致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未高先衰”。图4显示了各行业本科生(a)和研究生(b)就业比重较上年变化的趋势。从图中可以发现,2012年之后,本科生和研究生就业在制造业中的

<sup>①</sup>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

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在服务业中的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本文技能型劳动力更偏好于流入服务业的结论。在中国突破工业“四基”<sup>①</sup>制约的自立自强目标还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如果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现象不能根治,工业“四基”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都将受阻。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和人口大国而言,制造业是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蔡昉,2021;唐永、蒋永穆,2022)。“被动服务化”短期内对制造业技能型劳动力的某种抢夺,会导致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进而难以让制造业持续发挥对服务业的需求诱导作用,也就难以打破服务业的结构性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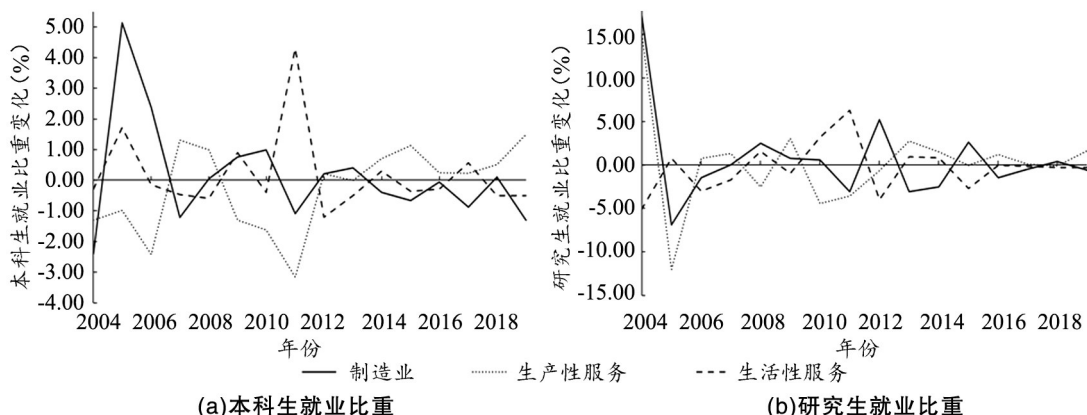


图4 高技能人力资本在各行业分布的变化趋势(2004—2019年)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三)“阵痛”还是“久痛”?

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结构“服务化”是必然趋势,而且受到工业与服务之间生产率差距的影响,这种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某种阻滞影响,即带来“阵痛”。然而,纵观中国的经济结构“服务化”演进历程,如前所述带有“被动服务化”特点,并非是完成了高质量工业化后的自然演进结果。改革开放至今40余年内,中国实现了时空压缩式的高速工业化,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这既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拥有人口等低成本资源禀赋优势相关,也是中国采取一系列不平衡发展战略支撑的结果。但这种时空压缩式的高速工业化带来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时空错位,可能使“被动服务化”的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不是“阵痛”而是“久痛”。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的“阵痛”期本质上是增长动能转换期,任何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而“久痛”则意味着动能转换的失败。

在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阶段,之所以产生“阵痛”转为“久痛”的担忧,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重困难息息相关。第一,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是创新能力,但中国技术创新正处于“向前”自主创新不足,“向后”技术引进模仿受限的两难境地;第二,作为技术创新、引领增长的重要部门,中国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难以形成大规模集聚式发展,从而引发中国三次产业间的比例结构虽日渐合理,但每一产业内部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的外优内滞问题,无法形成良性产业互动,通过产业融合等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受限;第三,中国收入差距总体上还未形成收敛之势,国内需求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未完成之际,带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潜在需求释放有限,中低

<sup>①</sup>工业“四基”是指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

收入群体的需求升级乏力,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内需拉动的大国经济优势,从供需双侧桎梏了经济高质量增长;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潜力不断减弱,人口老龄化问题越发突出,而现阶段的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特别是人力资本结构的配置扭曲不足以支撑要素配置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跃迁,“脱实向虚”不仅体现在资金配置上,而且在劳动力配置领域同样表现突出。除此之外,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进入动荡期,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不断涌现,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为履行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承诺提出了“双碳”目标,这对处于经济转型朝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考验。

#### 四、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

要推进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需要缩小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更重要的是打破潜在生产率增长空间并未充分释放的根本性制约。中国经济转型要想顺利渡过“阵痛”期,避免由“阵痛”转为“久痛”,就必须围绕提高生产率这一核心寻求突破。从西方发达国家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来看,历次技术革命是其转换经济发展动能,实现“换道超车”的机遇期。现阶段,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正沿着技术-资本-市场-产业-社会等扩散渠道迅速渗入到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的一个历史性机遇,而这一过程至少需要经历三个阶段(见图5),需要依据数字经济在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有侧重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李三希等,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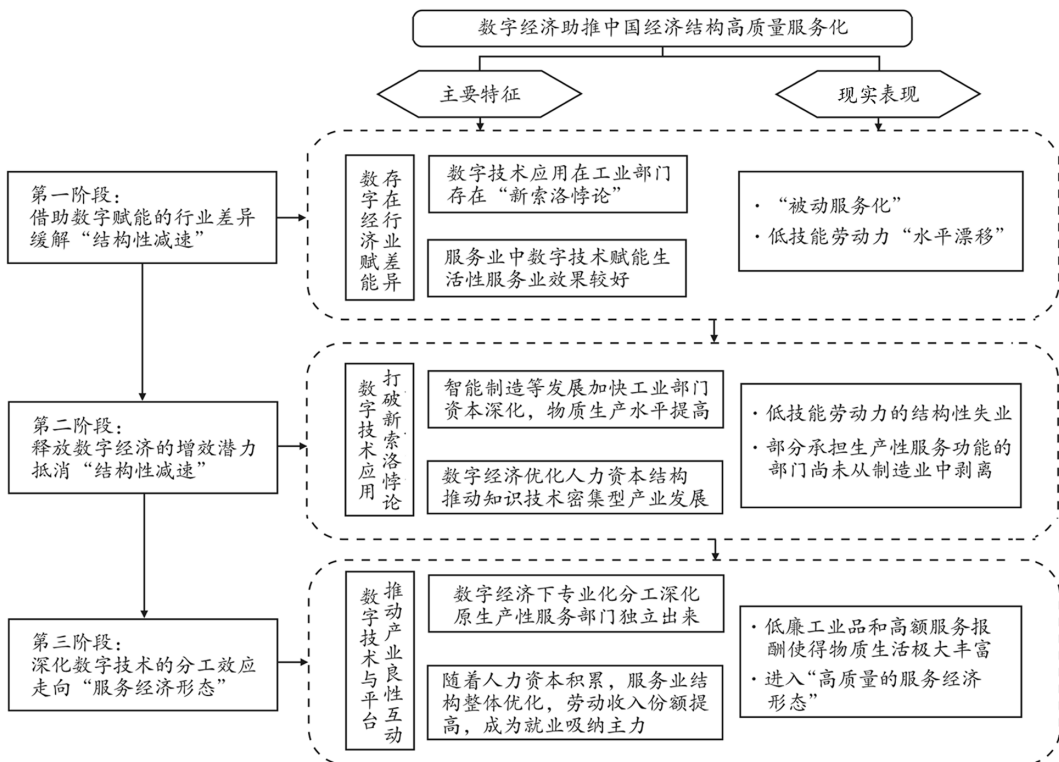


图5 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结构高质量服务化的三个阶段

### (一) 阶段一:借助数字赋能的行业差异,缓解“结构性减速”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在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缓解“结构性减速”,此时经济结构的演变仍摆脱不了“被动服务化”特征。传统经济条件下服务化带来“结构性减速”的前提在于行业间生产率差距,但这种生产率差异因为数字技术变革可能发生趋势性改变。在第一阶段,由于数字技术应用在工业部门存在“新索洛悖论”<sup>①</sup>,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融合渗透是从服务业发端,服务业率先享有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提升红利,因此可通过缩短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率的差距缓解“结构性减速”。

原因在于,第一,数字赋能初期因为成效的不确定性,更偏向靠近终端客户的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应用。相比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体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所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相对较少,而客户参与度、体验度和满意度却相对更高,因此生活性服务业成为数字赋能的先行领域。第二,数字赋能的效应大小高度依赖于进入产业数字化网络的企业节点的数量多少,相较于服务业,工业或者说制造业的产业链条长,工艺流程和生产组织方式复杂多样,其数字化网络效应发挥的临界规模更大,数字化改造的进程较慢。第三,服务业的城市集聚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高端化以及制造业岗位价值认同降低从而缺乏吸引力的现象使得工业或者说制造业的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相对短缺,这可能降低了数字经济对工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

综合来看,由于初期制造业内部结构性升级阻滞,服务业的数字化赋能集中于生活性服务业,形成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以及服务业低端蔓延的困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得到充分发展,数字经济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在第一阶段仍未摆脱“被动服务化”的特征。同时,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在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水平漂移”,难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实现就业的“向上跃升”。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仍突破不了“新索洛悖论”的第一阶段,政府可以将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作为数字经济优化经济结构的重心,从而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兼顾的发展目标。

### (二) 阶段二:释放数字经济的增效潜力,抵消“结构性减速”

“结构性减速”在进入服务经济的发达国家仍普遍存在,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在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抵消“结构性减速”,而提高全行业生产率是抵消“结构性减速”的核心。如果能够及时把握通用性数字技术的新技术革命契机,借助数字赋能克服产业内结构性矛盾、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全行业生产率,就可以抵消“结构性减速”,突破“被动服务化”困境。第二阶段会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期间会出现机器人替人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人力资本结构失衡导致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不足等多种问题,但经济结构将朝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的服务化方向演变。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应用,突破“新索洛悖论”,促使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首先,随着物联网、大数据、

<sup>①</sup>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并未带来统计数据上的生产率提升,称之为“索洛悖论”,而当前数字技术应用也面临相似困境,学者称之为“新索洛悖论”。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制造业企业可以将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推动生产要素高级化和生产流程智能化,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不断优化制造业内部结构。同时,数字技术要实现赋能,装备化是路径之一,这对智能装备制造和支持制造过程实现数字化的技术工艺都将产生直接需求,从而引导制造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其次,数字时代下制造业的高级化发展也会促进分工细化,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如以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服务型制造,会加速制造与服务融合的速度和广度,目前拥有技术和品牌优势的制造企业已然蜕变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大多具有知识密集型特征,在数字经济时代更易探索形成指数型增长路径,从而遏制服务业低端蔓延趋势,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

第二,数字技术会改变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加速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深化过程,促使满足人力资本要求的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动。随着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仿生制造等基础研究的深入推进,制造技术与数字技术在智能制造中深度融合发展,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将不断增加,物质生产水平也得以大幅提高。这是因为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高,甚至在数字经济时代可能会变得更高,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化资本将逐渐替代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力,如智能制造、机器人换人等。

第三,人力资本结构不断优化,劳动力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发展(何小钢等,2020)。如第二点所述,数字技术应用使得物质生产力大幅提升,物质生产成本和价格大幅下降,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一方面,数字经济孪生出的新产品与新功能将催生新的市场消费需求,从而带动智能化产业链中一批新型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产品丰富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将激发更多高端个性化服务和精神消费产品的需求,创造大量新的服务业如高水平教育与医疗的就业岗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匹配会导致数字技术应用在第二阶段前期产生结构性失业问题。这就需要借助数字经济的共享、集聚、外溢和匹配等效应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适应经济结构转型,为第三阶段的高质量服务经济形态奠定基础。

总而言之,第二阶段与高质量服务化的经济结构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为低技能劳动力被迫进入生活性服务业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部分承担生产性服务功能的部门仍未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等,因此这一阶段需要重视数字技术对中低端岗位带来的就业冲击与结构性失业问题。

### (三) 阶段三:深化数字技术的分工效应,走向“服务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在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向着发达国家的服务经济形态演变。在第三阶段,社会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智能制造下的物质生产极大化与现代服务业高报酬共同推动人民幸福生活。试想一种情景,物质部门全部由数字链接下的智能资本生产,服务部门全部由劳动生产,根据卡尔多事实,物质部门和服务部门的收入比约为3:7,那么劳动所获报酬足以实现人们的物质消费。

这一阶段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数字技术应用有效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原承担生产性服务的部门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首先,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下的关键要素投入,其低成本、高流动性及非排他的优势有助于突破时空与数量限制,同样的数据可以被不同的经济主体进行反复搜集与利用,从而促进产业间专业化分工的实现。其次,数字化平台帮助供需双方实现直接高效的互动对接,从而缩短传统产业分工中从源头设计到运输销售的冗长中间链条,使得各个经济主体可以根据及时的市场反馈进行生产专业化提升。独立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依靠其贯穿于生产各个阶段的服务,参与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成为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源泉以及市场资源的调配器;二是随着第二阶段数字经济下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优化,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变为服务业,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原中低技能劳动力通过有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技能培训及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机会,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实现个人职业层次的向上跨越,原无固定职业的“自媒体人”“家政服务人员”升级为“全媒体运营师”“健康照护师”,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带动服务业价格上涨,这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成本病”。

## 五、结论与建议

“服务化”是后发国家完成大规模工业化后的必经之路,但因结构转型失败而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国家不胜枚举。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如何应对经济“服务化”可能带来的转型陷阱,已经成为当下亟需探究和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首先基于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予以判断;其次从生产率差异和产业互动等视角对中国“结构性减速”的成立性进行再验证,并探讨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接着提出中国经济“服务化”是一种建立在制造业“未高先衰”上的“被动服务化”;最后探索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转型走出“阵痛期”的可能路径。研究表明:(1)2012年之前,中国服务业产出份额不断上升并非建立在工业产出份额逐渐下降的前提下,而是处于“去农业化”阶段,自2012年起,服务业和工业产出份额的“一升一降”以及劳动份额的“两低一高”表明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且这种“服务化”更多地体现为“被动服务化”。(2)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显著低于工业且两者并未呈现显著的骤降趋势,表明中国此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减速”,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普遍下降。即便考虑产业互动,“结构性减速”仍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最大成因。(3)生产要素被迫流入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可能会造成中国服务业低端蔓延和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的后果;经济增速放缓仅是“被动服务化”的外在特征,服务业低端蔓延和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才是“被动服务化”的本质体现。(4)生产率是造成和化解这一系列错综复杂难题的关键,要想顺利渡过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就必须围绕提高生产率这一核心寻求解决路径,数字经济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服务化转型的全新契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以放缓“服务化”步伐、调整“服务化”方向、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基本立足点,为中国顺利渡过转型“阵痛”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和增长跨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结构转型提供缓冲空间。一方面,避免盲目淘汰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丧失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充分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区域潜力,逐渐推进低端产业由沿海到内陆、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转移,形成区域间及区域内的产业“雁阵模式”。另一方面,重新构建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逐渐摆脱对技术引进和模仿的依赖,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外部保障,如实施税收、金融、投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2)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向,为结构转型打好发展基础。“服务化”替代“工业化”成为增长引擎离不开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政府要明晰现阶段服务业发展目标,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中国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服务业发展尚未成熟,应当限制低端服务业无效扩张,为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提前做好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制度设计和环境打造等方面的充足准备。(3)抓住数字经济机遇,为结构转型增添外部动力。一是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通过制造模式的模块化实现传统产业效率改进,如智能制造、定制化生产等;二是要依托数字技术优化供给结构,精准匹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解决供需错配难题;三是要依托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探索商业新模式和新业态。(4)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为结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一方面,以智力资源为依托,围绕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等主体,打造产学研协调发展的科技园区,重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必须打破以往的学校教授基础学科、企业提供实践经验的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大学科技园作为中介载体,塑造学校、企业融合培养人才的全新模式,为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高级化提供人力资本“量的有效积累”。另一方面,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制造业技能劳动力流出难题。制造业相较于服务业在区位选择上具有天然劣势,促进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提升制造业所在城市的吸引力是解决该难题的关键,这有利于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内“量的合理分配”。

#### 参考文献:

- 1.蔡昉,2021:《生产率、新动能与制造业——中国经济如何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 2.戴魁早、黄姿、王思曼,2023:《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2期。
- 3.郭克莎,2022:《突破结构性制约的中国探索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 4.郭克莎、彭继宗,2022:《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的国际经验》,《财贸经济》第8期。
- 5.韩永辉、黄亮雄、邹建华,2016:《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时代的来临》,《统计研究》第5期。
- 6.何小钢、罗奇、陈锦玲,2020:《高质量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经济评论》第4期。
- 7.江飞涛、雷泽坤、张钟文,2022:《制造业增长中的结构变迁与效率演变——对“去工业化”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8.李三希、武琦璠、李嘉琦,2023:《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时代意义、机遇挑战与路径探索》,《经济评论》第2期。
- 9.吕健,2012:《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性减速与经济增长分化》,《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 10.庞瑞芝、邓忠奇,2014:《服务业生产率真的低吗?》,《经济研究》第12期。

11. 宋建、郑江淮, 2017:《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产业经济研究》第2期。
12. 唐永、蒋永穆, 2022:《产业结构服务化会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极化吗?》,《经济评论》第2期。
13. 铁瑛、崔杰, 2020:《服务业发展“抢夺”了制造业技能吗? ——来自中国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财经研究》第12期。
14. 王兵、尹淑桃, 2020:《结构性减速视角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第3期。
15. 席强敏、陈曦、李国平, 2015:《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研究——以工业效率提升为导向》,《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16. 杨天宇、曹志楠, 2015:《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是“结构性减速”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17. 余泳泽、潘妍, 2019:《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经济研究》第3期。
18. 袁富华, 2012:《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3期。
19. 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 2016:《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经济研究》第10期。
20. 张月友、董启昌、倪敏, 2017:《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了吗?》,《经济学家》第5期。
21. Matthew, W., and Z. Basit. 2018. “Preference for the Workplac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Gende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1): 457–507.

## Crossing the Painful Period of Growth: The High-quality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Bai Xuejie<sup>1</sup>, Song Pei<sup>2</sup>, Lu Haiyong<sup>2</sup> and Li Lin<sup>2</sup>

(1: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once again verifies the validity of “structural deceleration” in China, points out the “passive” attribute of “servitization” in China’s economy,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 facts and consequences of “forced servitization”, and finally explores the possible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service-oriented in China’s econom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efore 2012, China’s economy was in the stage of “de-agriculture”, and since 2012, it has officially entered the stage of “servitization”, but this “servitization” is more embodied as “forced servitization” based on the “decline before the ris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lowdow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the “structural deceleration” caused by “forced servitization”, rather than the sharp decline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factors are forced to flow into the service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life service industry, which may lead to the low-e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technology-efficiency” upgrading path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roductivity” is the ke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must go through at least three stag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service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Keywords:** Forced Servitization, Structural Decelerating, Baumol’s Disease,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O14, O41

(责任编辑:惠利、陈永清)